



地处沿海，地理位置优越，贸易便利，是中国市场的入口和经济中心。19世纪中叶，东西方列强就从这里抢占中国市场，建立势力范围。上海有电车、高楼，赫赫有名的‘国际天际线’——外滩。有一点不能不坦白，过去的五十余年，列强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主要有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以及日本，他们的做法简单粗暴，无视中国利益，将中国人的利益和尊严踏得粉碎。这在他们发展上海租界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国际法角度看，这个‘国中之国’享有治外法权，在这里适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法律，所以中国当局不享有管辖权。”

怎么解释这种场景呢？王泠一展示了1927年4月15日拍摄的照片，日本帝国海军一等海防舰“八云”号的炮口对准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和在建的江海关大楼，“如果中国人反抗，享有中国内河通航权的外国军舰就能直接镇压，而在平时，列强掌握的旧中国海关和金融机构则在刺刀保护下日进斗金”。实际上，哪怕西方稍有点良知的人对此都不可容忍，久涅尔别尔格说：“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美英法日意等国巡洋舰长期停泊黄浦江，咫尺之遥的外滩洋商大厦、侨民俱乐部和时尚爵士餐厅却散发着优雅风情，这种浪漫无法抹去中国的伤痕。”

“上海是世界上藏污纳垢的场所，这里有数不清的酒吧，有人在里面喝得烂醉如泥，有人在里面买卖鸦片，买卖灵魂，买卖女人的肉体。上海有皮肤黝黑、戴着大头巾的印度巡捕充当公共租界可靠而忠诚的打手，有威严而高傲的英国人充当‘崇高秩序’的维护者。上海是奸商、密探、假绅士和骗子出没的城市，是贪婪剥削的城市，是工人拼死苦干，‘占有者’疯狂牟利的城市。”游历过当年世界几乎所有大都市的久涅尔别尔格不免给上海下了这样的定义，“这是可以大发横财的地方，是冒险家的乐园，到处充满激情，到处又冷酷无情。”

对于这样的上海，1933年2月17日，只为拜望“中国的良心”——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爱尔兰文坛名宿萧伯纳，很不情愿地呆了区区四个小时。有帮闲者吹捧萧翁驾临之际上海久雨放晴，“您福气真大，可以在上海看到太阳”，萧伯纳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这是太阳的福气，可以在上海看到萧伯纳。”萧伯纳对旧上海毫无好感，他对那些记者说：“上海至为恶劣，我对它没有什么兴趣。”请注意，萧伯纳也在上海看到中国的希望，那就是宋庆龄向他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及革命的新情况，离沪前夕，他发表的《给中国人民的短札》直言——“中国人民而能一心一德，敢问世界孰能与之抗衡乎”！

上海在资本主义世界被称为“亚洲巴黎”“黄魔之城”，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注视上海，却源自重重阶级压迫下蕴含的惊人反抗力量。苏联记者A.E·霍多罗夫在1922年所著《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中提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号召东方各国被压迫人民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1920年4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代表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以新闻记者的公开身份前往中国，名义上是在中国组建一家华俄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在中国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行性”，同行的还有妻子库兹涅佐娃、提供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等，维经斯基也由此成为“与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也是西方史学界评价的“最默默无闻的伟大工作者”。

“多少年来，中外专家讨论不休的课题，就是维经斯基为什么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阵地放到上海？”俄联邦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解密档案显示，他们首站是抵达天津和北京，通过在大学任教并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的俄籍教授S.N·波列夫伊（中文名“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中文名“伊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及其周围的革命青年建立联系。然而，北洋军阀势力严密控制的北京缺乏工业，缺乏工人阶级的大部队，在坚持十月革命经验并看重这一点的共产